

乡村经济新特征需高度关注

□□ 马德富

三农时评

快速城镇化,人才、资金等乡村要素随着人口流动,快速流向城镇。当前,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启动实施,城乡发展进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新阶段,能人回乡、城镇居民下乡、企业兴乡带动下的城镇人才、城市社会资本等要素向乡村回流已经成为基本趋势。究其根源,还是因为乡村资源价值凸显,市场在乡村要素资源配置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和有为政府引导的结果。

当前,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启动实施,城乡发展进入“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新阶段,能人回乡、城镇居民下乡、企业兴乡带动下的城镇人才、城市社会资本等要素向乡村回流已经成为基本趋势。究其根源,还是因为乡村资源价值凸显,市场在乡村要素资源配置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和有为政府引导的结果。农业税取消前甚至在2005年前,广大村民之间流转土地不需要支付费用;流转林地、荒坡、滩涂等,则是以“片”为单位一口价,算下来,不少地方一亩林地的年流转价格不到1元。现在,全国农村土地、林地、闲置农房经营(使用)权流转率、流转价格均越来越高,既是农村资源价值凸显的明证,也是发展要素向乡村回流并与乡村资源加速对接的重要体现。

乡村新型经营主体培塑期。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标志,集中体现在推动“两个融合发展”上,即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这也是乡村振兴的必经路径。这两个融合,使价值

凸显的乡村资源和持续流向乡村的要素之间产生激烈“碰撞”,从而推动乡村新型经营主体朝着多元、快速方向发展。一方面,城乡融合发展,将会吸引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外出农村能人、新知识阶层、退伍军人、城市工商企业家和城镇居民等到广大农村去,进而带动城镇人才、资金、信息、知识、市场等发展要素下乡,实现与乡村土地、森林、闲置房产、特色文化等资源的有效对接,要么旅居康养、要么开展乡村双创,快速形成推动乡村振兴新的力量和成长起来一批乡村新型经营主体。另一方面,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将会改变并丰富乡村资源的利用方式和由原住民农民独撑乡村天下的格局,快速成长起来一批经营农产品加工、乡村文创、乡村旅游、中小研学、乡村网红打卡地、乡村军事训练等的新型经营主体。

乡村利益结构重构期。在家庭联产承包制这一基本经营制度框架下,既往的乡村利益结构,主要表现在对家庭经营以外的村集体尚未分包到户的土地、塘堰、沟渠等村级资源的使用,或由这些资源带来的各种收益的分配上,以及在农产品生产、销售过程中,面对共同政策、技术、市场时,形

成的各种利益关系,主要是通过村集体组织内部的村民自治来实现,本质上是村级组织内部农户对农户的利益表达。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随着乡村资源价值凸显和城镇要素下乡,乡村利益结构将出现一些新的变化。首先,是利益主体结构的重构。随着城乡和农村三产加快融合发展,乡村主体将从原来封闭、静止、单一的一元主体转向城乡融合的开放、动态、多元的城乡公民混合主体。其次,利益连接方式的重构。将由过去农户之间在自治组织内的约定俗称、民主决策式的表达,变成出租土地的村民、参与劳动的村民、村集体等与乡村资源经营权流入方之间的契约表达。另外,是利益分配方式的重构。将由过去共享、平均式的分配方式,变成参与式、按劳(股)分配。

面对上述乡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特征,需要进一步加大既有政策的执行力度、需要与时俱进地加快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一是各地要切实加快建立乡村资源交易平台,引导各类资源流转走上公开、公平、透明和规范的轨道;二是进一步拓展城镇居民及相关要素下乡的渠道,出台相应的引导支持政策,引导城镇人员及要素有序下乡,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引导各地加快出台贯彻落实农村耕地、林地、闲置房产“三权分置”的具体措施,尤其要超前考虑法律护航“三权分置”的具体举措并逐步加大保障力度;四是站在“乡村治理与乡村发展”视角,加快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有针对性地提高乡村治理水平,有效护航乡村发展。

(作者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用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一直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政府工作报告和“十四五”规划中,均提出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用数字技术推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早在2018年1月2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做好整体规划设计,加快农村地区宽带网络和第四代移动通信网络覆盖步伐,开发适应“三农”特点的信息技术、产品、应用和服务,推动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等应用普及,弥合城乡数字鸿沟。这开启了数字乡村建设的序幕。之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等一系列文件更是进一步对数字经济赋能乡村振兴进行了具体部署。在国家战略的推动下,各地纷纷相继出台数字乡村发展政策文件,统筹推进,多点开花的数字乡村振兴的政策格局正在逐步形成。

数字乡村四步走,循序渐进步步为营

第一步是到2020年,数字乡村建设取得初步成就。在这一阶段,笔者认为关键词是“基础”。简单而言,在这个阶段中,重要的任务是让数字经济在乡村中“从无到有”,具体主要体现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和相关数字服务的普及。一系列的数字技术都需要相关新基建的扶持,比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都需要互联网覆盖率的全面提升,一系列机械化、智能化生产也需要充足的电力供应和传感器体系,基建的完善度是未来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客观基础。这一阶段通常成果比较明显,也更容易量化衡量,一般速度较快,成果较多。

第二步是到2025年,数字乡村建设要取得一定的重要进展。该阶段笔者设置的关键词是“产业”。如果说第一阶段是在打基础,那么从第二阶段开始,就是在逐步建立数字乡村的上层建筑。农业生产是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农村又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场域,数字乡村振兴必须要从数字与农业的结合入手,实现农业的数字化转型,并从农业出发辐射和衍生其他相关产业,在产业层面广泛融合,多元发展;在地理层面连点成片,形成集聚效应。数字经济赋能乡村建设,要在乡村互联网和基础设施充分普及的基础上,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用数字经济孵化新农业业态,调动农业生产积极性,依托农产品和区域特点,打造乡村品牌,形成具有全国甚至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带,以数字促生产,以生产促发展。

第三步是到2035年,数字乡村建设取得长足进展。该阶段的关键词是“服务”。当基础设施已经基本完善,乡村相关产业也均完成数字化转型升级,此时的工作重点就在于促进城乡基本功能公共服务的实现,这同样还需要配合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数字化技术的帮助下实现现代化、智能化,一个真正宜居、发达的美丽乡村蓝图才得以呈现在人们面前。生产服务化是当前产业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农村作为将这一生产和生活紧密联系的场景,农业生产服务化变得更加的必要,之后以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特点为基础,借助移动终端和数字化技术实现乡村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比如打造乡村治理平台,乡村事务平台,让农民参与居民自治体系,便捷化新农合等一系列办事程序等等。

最后一步就是到21世纪中叶,在我国迈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同时,数字乡村全面建成,农业生产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农村生态建设取得突出成就,农民收入水平达到较高水平,城乡之间生活品质、公共服务水平、收入水平等存在的鸿沟被逐步抹平。

我国正处于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关键衔接处

当前我国在农村基建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数据显示,当前全国行政村通光纤和通4G的比例超过98%,农村宽带接入用户数已经达到1.42亿户,许多乡村均建立了自己的物流站点,乡村物流网开始渐渐成型。在农村基建不断完善的条件下,我们也积极探索在数字产业方面取得突破,许多地区积极拥抱电商等新兴模式,实现农业生产数字化、农业管理数字化、农业销售数字化。

现存的许多数字乡村衡量机制仍然是以更容易量化的基础设施为依据,这种方式的确在数字乡村的第一阶段建设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在中央出台战略文件之后,各地纷纷开始吹响数字乡村振兴的号角,通过给下级单位设定考核指标,下级单位有方向可循,有目标可追,因而上下一心共同加紧推进农村新基建进程,促成了当前农村基建较好的局面。然而,当数字乡村振兴逐步走到第二阶段,现存的第一阶段评估方式就稍显“表面功夫”,如何进一步利用好这些建设完成的基础设施,如何更好地发挥基建为数字化提供的支撑作用,如何做好数字化赋能农业农村生产生活的工作是从“表面功夫”向纵深推进的关键。笔者与政府相关部门和业内人士进行了一些交流和调研,发现一些乡村管理机构的思想认识仍然还停留在数字经济就是建几个快通站,修几个信号塔的层面,其实,建设数字农村,绝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

数字乡村建设向纵深推进,笔者认为首要任务就是要从顶层设计开始,从一体化管理出发,从思想出发。相关管理部门和乡村治理部门要转变原有的政绩思想和成果思想,要不拘泥于客观上的基建建设,更要深入贯彻落实数字经济与产业的融合,让数字技术走入农民生活,走进农业生产。

数字经济需要一个完整多元的生态作为支撑,而在农村实现数字生态“从无到有,从有到精”是一个长期、深入的过程,一蹴而就只是一个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短期办法,管理者一定要将眼光放长远,要敢于做成果回报时间长,但正外部性巨大的工作。同时,对于数字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有顶层设计意识,对于数字经济与产业的融合要有全局观,针对临近的乡村要根据各自比较优势形成产业互补、协同创新的合力,优化资源配置,做好科学合理的规划。

融合生产,从多个环节重塑农业

那么,在此之后,数字乡村振兴工作就要将这些科学合理的规划落地实施,充分发挥基础设施的作用,借助数字化手段推动农业农村生产的转型升级。

一直以来,笔者都在强调,数字经济最大的魅力是融合,而真正借助数字经济为乡村振兴赋能需要做的事情,是要让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相融合,与现实产品相融合,与农民需求相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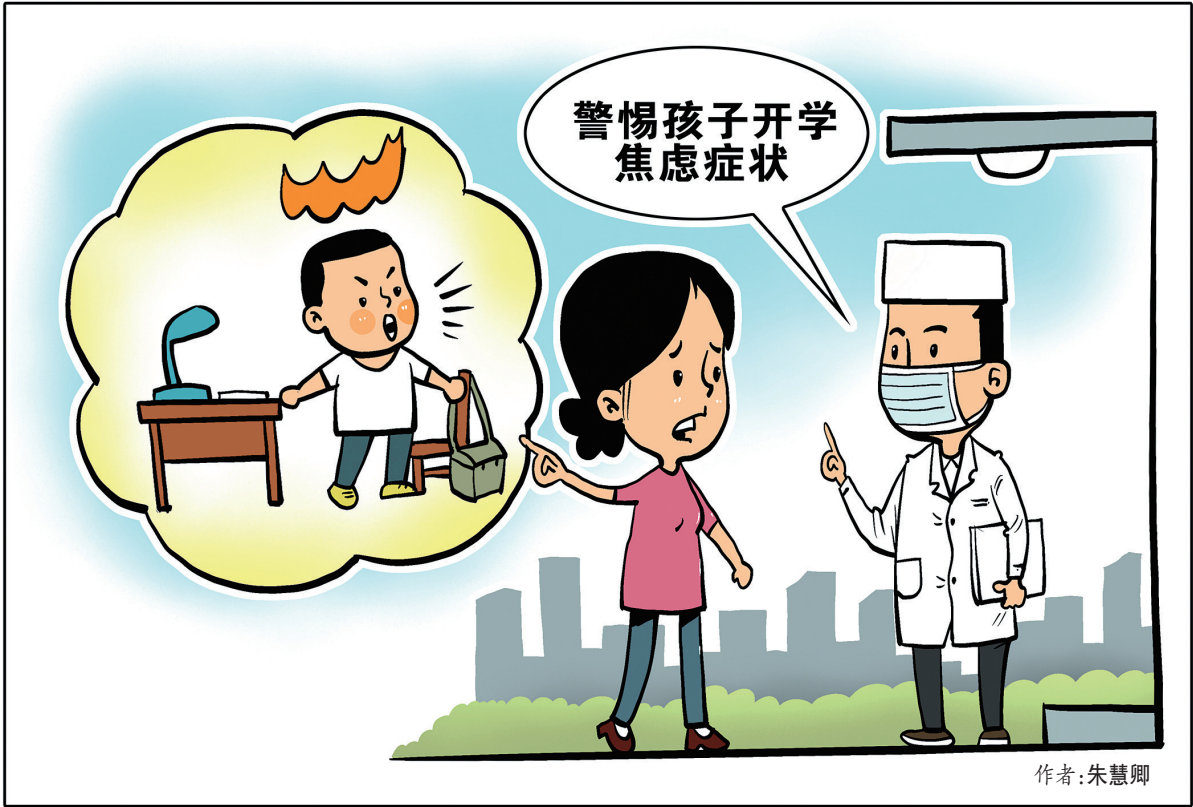
先说农业生产,数字化农业生产需要对土地等资源实现一定的整合,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规模经济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积极探索与当地企业的合作,研讨出与农民诉求和企业发展目标相一致的合作方案,共同推进农业生产的数字化进程。比如河南伊川县的岭上砾薯产业就是 will 许多村镇的土地统筹管理,规模化种植,借助数字化的管理体系提高了红薯的生产效率,树立产品形象,打造产品品牌,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除了田间地头的生产,还有销售物流网络的建立。笔者发现,目前许多乡村的数字农业建设仍然还是停留在对传统模式的改良,还没有真正走上数字经济的道路。笔者调查了一些地区的农业特色淘宝店,许多地方店铺虽然产品种类多,但只有一张图片介绍,缺少借助数字化手段让消费者了解产品生产的一系列流程和产品的优势。而且,笔者与一些政府管理人员交流发现,目前许多村镇虽然在建数字乡村,然而他们的农产品仍然是传统的经销商渠道模式,而缺少电商到户,产品直抵消费者的数字化网络,这一点我们需要借鉴阿里巴巴的“热土计划”,让企业和数字化模式真正走进农村,彻底改变农业生产和销售的传统模式。

同时,在建设数字乡村过程中,虽然我们的重点在农业生产,但也不能“画地为牢”,将眼光仅限制在农业这一块,融合的含义不仅仅是数字与实体的融合,还有不同产业间的融合,不同主体间的融合。比如要积极尝试设立数字化生态基地,将旅游业和农产品种植业联系在一起,探索建立乡村产业带和产业中心,将农产品种植和食品药品深加工行业联系在一起,拉长产品价值链,提高附加值等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的数字乡村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这些更多的是停留在完善基础设施的方面,要想进一步发挥数字经济的作用,要想进一步实现农业数字化和农村现代化,就需要基于“表面功夫”而进一步纵深推进数字经济建设,包括管理层面的转变思想、顶层设计;还有农业生产方面的智能化生产、数字化产品网络、信息化宣传渠道等;再就是农业与其他产业的有机融合等。数字乡村振兴不是一锤子买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不断推进的工作,需要各部门、各组织、各个体有耐心、有毅力地去下功夫,敢于突破,勇于创新,不仅仅做表面功夫,更要把工作做实,做深。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



作者:朱慧卿

热点观察

提升广大农民媒介素养是社会发展诉求

□□ 张开 王奎

当今时代,数字媒体高度发达,各种社交媒体已经从城市蔓延至乡村地区。无论是在家务农的农民还是外出打工的农民工,都不可避免地要在社交媒体上花费大量时间。但在这一过程中,媒介素养的缺失容易让农民朋友在鱼龙混杂的信息环境中失去辨别的能力,进而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1992年美国媒体素养研究中心对媒介素养养下的定义是:媒介素养是指在人们面对不同媒体中各种信息时所表现出的信息的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8月27日发布的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至2021年6月,我

国网民规模为10.1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1.6%。其中,农村网民规模为2.97亿,较2020年3月增长5471万;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为59.2%,较2020年12月提升3.3个百分点,城乡互联网普及率进一步缩小至19.1个百分点。由此不难看出,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和总体的差距在不断缩小。

在这一背景下探讨提升农民朋友媒介素养显得尤为必要,更是社会发展的诉求。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乡村媒介素养教育不仅关乎乡村振兴总要求中的“乡风文明”“治理有效”,更是缩小城乡差距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观察点。乡村地区拥有庞大的人口,他们的媒介素养一定程度上可以反作用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如何发挥正面影响、削弱或者抵制负面影响,是媒介素养研究学者

和三农工作者的使命。

首先,提升农民媒介素养可更好地实现乡村有效治理。政府部门与社会力量联合,加强农民对信息源的科学辨别力度,有利于提升社会治理效率,让新媒体更好地在农村地区得到应用。教会农民朋友如何正确使用媒介、辨别消息来源,可以从源头上助力实现乡村地区的“治理有效”。

其次,提升农民媒介素养可更好地帮助他们从社交媒体获取有效信息。谁能获取更多信息,谁就能在一个行业的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更多机会。当前,“抖音”“快手”“今日头条”以及微信群成为农民朋友尤其是以“95后”为代表的新生代农民以及返乡就业创业农民的日常娱乐生活和获取信息的重要手段。通过培训他们对有效信息的获取能力,辨

别微信群内传播信息的真实性,可以更高质量助力农民朋友择业就业。

再次,提升农民媒介素养可更好地提升他们对社会的认知,从而改善农民在网络上“失语”的现象。长期以来,在面对重大突发事件如洪水、地震等情况时,乡村地区明显“失语”。在城市,人们可以通过新媒体手段获取信息、发布信息,利用各种媒介求助、扩散需求;而乡村地区的农民由于获取信息能力弱、与新媒体绝缘或不会利用新媒体导致失去了很多机会。社交媒体在乡村地区的发展给予了农民接触新媒体的机会,通过提升媒介素养可以改进他们在网络空间的表达和参与力度,进而让乡村与城市一道在网络空间共存,也让社会对乡村地区有更真实、更客观的认知。

应引导新生代农民工适度上网

□□ 刘秋实

近日,《2020年北京市外来新生代农民工监测报告》发布。报告显示上网已经成为新生代农民主要休闲活动,占业余时间的60.1%,比上年同期提高4.7个百分点,业余时间参加学习培训占比为3.8%,比上年同期下降2.5个百分点。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对网络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增加。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周岁及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员,

大多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住宿餐饮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中。日常工作压力大、工作时间长是这些行业的典型特点,业余时间需要适当的休闲放松来转换心情、缓解疲劳。智能终端的普及、网络飞速发展和媒体内容多样化,为新生代农民工休闲娱乐提供了较大的便利。

适度合理上网是消除疲劳的有效办法,也是拓展眼界、增长见识、获取信息的良好渠道。但同时也要认识到,过度

沉溺网络,看短视频成瘾、沉迷刷剧和手机游戏,只会让人陷入追求短暂的、刺激的快乐中,无法带来长久积极的获益。每天动辄用两三个小时“网上冲浪”,不仅严重影响身心健康,也会导致与亲人疏远、与社会脱节,更重要的是影响正常的工作,止步于浅层次的满足,丧失奋斗意志,白白浪费用于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宝贵时间,让新生代农民在人才的供求市场中失去竞争的能力。

自我提升是农民工充实业余时间

的更好选择。农民工朋友既可以通过读书看报、参加文体活动来培养良好的兴趣爱好、陶冶情操,也可以积极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有针对性地学习理论知识、锻炼专业技能,练好内功,形成竞争优势。同时,政府应当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和需求因势利导地组织多样的职业技能培训、学习和交流活动,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营造更加宽松的就业环境,让具有更高技能、素质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扎根和过上好日子。